

# 移植与再造:论《赤光》与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

贾 凯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赤光》是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创办的刊物,该刊物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为武器,围绕反军阀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两大中心内容,向旅欧华人揭示了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批判和揭露了军阀祸国与内讧的真相、世界资本主义的反动风、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的本质。《赤光》的话语建构是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移植”到中国,再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对近代中国革命话语“再造”的尝试。

〔关键词〕赤光;少共;革命话语;帝国主义;国际联合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7)06-0049-06

DOI:10.14110/j.cnki.cn-37-1059/d.2017.06.007

留法勤工俭学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影响很大的一个群体。留法时期是这一群体形成并成长为职业革命家的关键阶段,了解这一时期他们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机关报的《少年》、《赤光》恰好是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少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赤光》则是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宣传国民革命的重要报刊。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周恩来的相关思想和实践,也有个别学者以《少年》为切入点探讨该群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而对于《赤光》的研究尚未有专题成果。因此,以《赤光》为切入点探讨该群体建构中国革命话语的探索,有助于深化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研究。

## 一、“实际的”《赤光》创刊及其概况

1922年6月18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国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下简称“少共”),这是一个共青团性质的组织。当时中共旅欧支部处于秘密工作状态,党的活动主要以团的名义开展,因此“少共”在当时的旅欧华人中影响很大。两个月后,“少共”机关刊物《少年》创刊,在中、法均有代售处。该刊物最初由赵世炎负责,张申府、周恩来经常为其撰稿。《少年》原为半月刊,出至第6号停刊;1923年2月“少共”改组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该刊物复刊并改为月刊;7月1日后改为不定期刊物。到1924年2月为止,《少年》共出13号,其中第12号仅28页至47页可见<sup>①</sup>。尽管存在时间较短、仅出刊13号,但是《少年》对于“少共”的思想训练、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以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具有重要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的探索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7YJC710030)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16M60207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贾凯,男,法学博士,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① 崔春雪:《〈少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的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达成。为适应当时的革命形势,“少共”于1924年2月1日出版了《赤光》杂志以代替《少年》,原为半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赤光》继承了《少年》宣传苏俄革命的特色,意蕴“革命的赤光,从北俄腾起”,“夜已阑,天将晓,赤色之光,早在东方闪动了”<sup>①</sup>;围绕着反军阀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赤光》更加突出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介绍,为国民革命宣传和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提供了载体。《赤光》现存19期,其中1924至1925年有16期(第21、21期为合刊),部分有缺页,字数总计逾19万。另外,1929年出版的第45、48、54期不完整。由于组织经费紧张,只能采用手刻印刷。

分析1924至1925年共计16期的杂志,不难看出,《赤光》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文章体裁多样,语言犀利深刻。每期文章篇数、页数不一,文章包括政论139篇。其中2篇译文,读者来信8篇,中国共产党或“少共”的文件、通告、启事共计17篇,卷首语9篇,含多篇诗歌。第二,编辑者、作者众多,可考证的作者有16人,其中周恩来、任卓宣、萧朴生、李富春、邓小平、熊锐发表文章较多,分别为37、30、11、6、3、3篇,且周恩来、任卓宣均担任过主编。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论述国民革命问题,围绕“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的中心主题展开。与偏重理论的《少年》相比,《赤光》更为关注现实问题,因而问题意识强、现实指向明确。统计词频可以发现,“革命”“阶级”“帝国主义”“军阀”“国民”“资本”“压迫”“无产阶级”“共产党”为主要的高频词汇,说明该杂志主要围绕中国革命展开论述。正如《赤光的宣言》所声明“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sup>②</sup>。《赤光》基于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在旅欧华人中揭露了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的反动本质、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北洋军阀的祸国行径,为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作出了有益探索。

## 二、《赤光》与反军阀反帝革命话语的建构

《赤光的宣言》提出了刊物宣传的“唯一目标”: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按照办刊设想,《赤光》主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介绍、评论中国时事,指出中国政治经济的乱源及解决办法;二是揭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际背景,即介绍“国际情势”;三是指出中国的唯一出路,揭示其他救国道路不能实行的原因。综观《赤光》16期的内容,该刊物围绕着这“唯一目标”,从以上三个方面建构革命话语和开展宣传工作。当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对于“国民革命”“军阀”“帝国主义”等革命话语的认识存在差异,而“少共”身处国际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又面对着《先声》等反动舆论攻击,其建构中国革命话语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

### (一) 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为基础,划分中国革命的各派势力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是《赤光》运用的主要方法,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与中国革命有关的人划分为军阀、国际帝国主义、被压迫民众三类;二是认为中国尚处在“有产阶级尚未胜利,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又萌芽底时候”,社会阶级包括封建阶级(满清余孽——军阀)、有产阶级(各种资本家和依附于他们的智识者)、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商业雇员、农村的工人、佃农、贫农等)三个部分<sup>③</sup>;三是认为革命势力包括四类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既被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掠夺,又求卵翼于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工人(能够担当统治阶级,但尚处于幼稚阶段)、农人(数目很多,散居在农村,智识落后,有待于组织和训练),这四类人若能联合,革命力量就能发展壮大,并能打倒军阀和推倒国际帝国主义<sup>④</sup>。《赤光》又根据各阶级与生产力的关系,将他们分为最复古的、较进步的、最进步的三种势力,并把国民革命总结为各阶级的革命势力联合向封建阶级进攻,同时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争斗。“军阀”被定义为

①② 《赤光的宣言》,《赤光》1924年第1期。

③ 任卓宣《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赤光》第9期。

④ 任卓宣《国民革命必然和可能》,《赤光》第3期。

封建余孽、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和非正义的一方,变成了国民革命的对象;原本“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的国民党,在《赤光》等刊物的宣传下改变了以往“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的形象,朝着“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国民革命之领袖”的方向进步。以上几个方面均为“少共”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为基础建构的中国革命话语。

#### (二) 阐述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革命的关系,论证打倒军阀必须先推翻帝国主义的主张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也是《赤光》论述的基本内容。一方面,《赤光》指出:军阀与帝国主义是狼狈为奸、二合一的“妖魔”、人民公敌,国际帝国主义是军阀的“太上政府”,军阀是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纪人”。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渗透是为了获得原材料、倾销商品、刮取人民“脂膏”。国民革命及其革命成功后的实业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利益存在根本冲突,他们会揭开亲善的面具,露出狰狞的鬼脸来束缚中国工人、学生的革命行动,压迫中国的革命势力<sup>①</sup>。因此,国民革命的成功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为条件。另一方面,《赤光》主张:中国的国民革命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不能忽视中国的国际殖民地属性,以及中国革命是殖民地有产阶级革命的特殊形式<sup>②</sup>;国民革命与封建制度下的工商资本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被封建制度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性质不同,是一种被半封建制度、帝国主义强权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sup>③</sup>。这说明中国社会存在各类矛盾,国民革命的敌人并不是唯一的。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联、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两方面来看,开展国民革命与推翻帝国主义是“合二为一”的一场革命,这是《赤光》所建构的革命话语的基本观点。

#### (三) 辩证分析国民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

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如何,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与国民党合作,这是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移植”到中国、“再造”中国革命话语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中国青年党是“少共”的劲敌,他们以《先声》为阵地歪曲国民革命、国共合作。对此,《赤光》一方面指出中国目前应实行国民革命,因为立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既有味于本阶级底革命势力,亦且不懂得中国底有产阶级还未掌握政权底形势。这样的争斗只是延长了封建阶级底政治”<sup>④</sup>。针对“共产主义者干国民革命是列宁所反对的”的谬论,任卓宣反驳指出“国民革命符合列宁《怎么办》、《两个策略》及共产国际二大、四大的精神”<sup>⑤</sup>。针对青年党“共产党人何不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诘难,《赤光》积极回应并认为,共产主义者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革命,如果国民革命不成功,那么“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正所谓“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sup>⑥</sup>。另一方面,针对曾琦等人发表的“共产主义者就不应该加入国民党”的观点,《赤光》进行了反驳。林蔚指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做国民革命的工作,是符合《共产党宣言》的精神、遵从第三国际的决定、经中国共产党全党赞成、国民党决议通过的革命实践;国民党是集合各派革命分子的政治团体,“热心革命”的共产党人自然要加入,青年党如果要革命就应当与国民党合作<sup>⑦</sup>。《赤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国民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和宣传,贯穿着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原则,即革命要促进社会进步,共产主义革命要从推翻一切现存制度着手。

#### (四) 论证建立反帝国主义国际联合战线的必要性

论证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是“少共”建构革命话语的一项重要内容。《赤光》主要从列举苏俄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对华友好的事实,从分析苏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民族平等

① 任卓宣《国民革命必然和可能》,《赤光》第3期。

② 卓宣《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化》,《赤光》第17期。

③ 萧朴生《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赤光》第28期。

④⑤ 任卓宣《国民革命与阶级争斗》,《赤光》第9期。

⑥ 恩来《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答胡瑞图、吴樵甫、威重三君》,《赤光》第9期。

⑦ 林蔚《批评曾琦君底〈神圣联合与统一前敌〉》,《赤光》第7期。

和自决的政策这两个角度宣传建立反帝国主义国际联合战线的必要性。第一,宣传苏俄对华友好、平等、和平的事实。针对苏俄与北京政府谈判陷入僵持的局面,《赤光》向旅法华人解释“苏俄不计较中国从前之倒俄政策,数年以来至今日仍坚持忍耐,力谋两国正式邦交致恢复,难道他(苏俄)还变更么?”<sup>①</sup>,并警告《先声》不要站在攻击苏俄的反革命阵线上;中俄协定签订后,周恩来指出“苏俄永远是弱小民族的朋友”<sup>②</sup>,以后将站在帝国主义的对立面为中国说话。第二,报道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声援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事例。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托洛茨基致电中国人民,声称苏联“十分完全地站在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底地位上……为中国人民之解放争斗,是每个革命者底义务,尤其是共产党人底义务。”<sup>③</sup>莫斯科于1924年9月成立“勿犯中国会”,“全俄工会联合会”通告表示反对帝国主义、援助中国人民,莫斯科的大学生组织示威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在第一国际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法共将“反对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列入会议议程,开会时各国工人高呼“中国万岁”以声援中国人民<sup>④</sup>。第三,从理论上论证苏俄不仅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先锋,也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使者。《赤光》认为,苏俄是由工农兵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唯一地以解放被压迫阶级为目的之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苏俄要本其解放本国无产阶级之志愿,来解放他国被压迫民族”;苏俄是无产阶级国家,反对侵略、有产阶级,因此要组织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对于被压迫民族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苏俄鼓励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国的独立运动,因为“在帝国主义国家称霸底世界中,苏俄只有于集中各国无产阶级于其旗帜之下,再集中一切被压迫民族于其旗帜之下,才能生存于世”<sup>⑤</sup>。总之,《赤光》围绕着以上三点从实践、理论两个层面论证了苏俄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和建立反帝国主义国际联合战线的必要性。

### 三、《赤光》建构中国革命话语的特色

作为机关报的《赤光》,是“少共”宣传革命理论与政策的“喉舌”,该刊语言犀利活泼、分析论证严密,在旅欧华人中起到了重要的宣传和启蒙作用,对于国内的革命宣传也有帮助,特别是介绍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动风方面。时任《中国青年》编辑的萧楚女评价《赤光》:“对于欧洲方面的时局观察,颇能予人以一种明了确当的观念……有[尤]可贵者,则为揭发海外各帝国主义者对华组织之侵略的黑幕……吾人深居国内,一切不明究竟,得此则眼光如炬。”<sup>⑥</sup>同时,《赤光》以大量篇幅报道、分析国内政治局势,转载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最新精神,其话语风格免不了受中共中央的影响。《赤光》建构的中国革命话语反映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局势的新特点,对中共中央的宣传具有积极影响;另外,《赤光》注意结合旅法华人的生活实际,自觉地宣传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这体现出旅欧“少共”建构革命话语过程中国内外因素的互动,也使《赤光》呈现出与其它刊物不一样的特色。

#### (一) 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唯物史观为武器,力求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

中共二大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号召建立包括工人、贫农、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但陈独秀认为“民主革命”这个口号“偏于纯资产阶级的”,中共开始以“国民革命”口号代替“民主革命”来进行宣传。“少共”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为基础宣传国民革命作为中心内容,即反军阀的国民联合和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革命”是当时《赤光》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高达1294次。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主张不同,“少共”的革命话语建构贯穿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阶级”“帝国

① 署名、标题因缺页无法得知,参见《赤光》第8期。

② 恩来《中俄协定的签字后》,《赤光》第10期。

③ 石电《“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赤光》第17期。

④ 富春《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之新发展》,《赤光》第17期。

⑤ 任卓宣《苏俄与被压迫民族》,《赤光》第21、22期。

⑥ 楚女《新刊批评》,《中国青年》第40期。

主义”“军阀”“资本”“国民”“压迫”“无产阶级”“共产党”“中山”是另外9个高频词汇,“国民”“帝国主义”与青年党的“全民”“强权”含义均有大的差别,这也是双方分别以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主义建构革命话语的不同结果。“少共”的话语已避免直接谈及“共产革命”“专政”等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但是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以阐述“军阀”“国际帝国主义”概念的科学性以及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贯穿于《赤光》的论证分析中,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军阀祸国史”“资本主义反动风”的梳理论证,体现出该刊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这也是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移植”到中国,“再造”中国革命话语的具体表现。

首先,指出军阀不可靠,唯有民众才是中国革命的可靠力量。周恩来指出“新旧军阀既都不足恃,所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并预言“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来做弄潮人。”<sup>①</sup>这体现出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科学认识。其次,通过对经济现状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应被推翻、新中国能够被创造。《赤光》通过多篇文章分析欧战后资本主义的危机,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国内经济的危机,不得不与苏俄“重修旧好”,承认苏俄;苏俄经济基础已经稳固,已能与世界帝国主义相抗衡;中国留学生也应该从德国货币改换之中得到教训,对社会制度发展有所觉悟<sup>②</sup>。再次,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批判国家主义的“唯心论”。针对青年党人搬出“孔子的国家主义”,以“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见来抵抗侵略的妄想,《赤光》批判其不注意物质生活、经济利益等“实际问题”,以“我国光荣之历史”来培养国民自尊心、敌忾心的做法是“非科学的梦想”,并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出于资产阶级输出商品、掠夺原料的需要,而非出于“夷狄之见”,最后指出资本主义已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是大趋向<sup>③</sup>。《赤光》依据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使旅欧华人明确了国民革命的依靠力量和内在逻辑,大大消除了唯心史观的负面影响。

## (二) 以建构中国革命话语为主,兼与反革命势力争夺话语诠释权

“国民革命”一词是《赤光》建构的核心话语,该词最早出现于1906年孙中山、黄兴等人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但此后革命党人较少使用该词。1922年之后,中国共产党赋予“国民革命”新内涵并进行“再造”后,该词才逐渐风靡,也被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认同。“少共”对于“国民革命”话语的建构,得到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及大部分旅欧华人的支持和响应。根据各阶级是进步还是反动,《赤光》分析了几对矛盾关系:封建军阀、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革命派(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与反革命派(北京政府内的各派别、青年党人、基督教青年派、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右派)。是否进步和革命是1920年代政治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少共”将是否代表民众利益、工人阶级立场作为划分进步与反动的标准,这样便把新旧各派军阀列为反动力量的代表。是否代表民众利益很难量化,“少共”又基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将与苏俄是否友好作为衡量革命与否的标准,将反对与苏俄合作的青年党人、国民党右派列为反革命的代表,并将国民党划分为左、中、右三派。

同时,“少共”与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右派分子、青年党人积极争夺话语诠释权,批判他们对“革命”“爱国”的阐释,并将右派分子称为“叛党之徒”“反革命派”,还揭露了他们相互勾结“出反共产主义底恶气”的行为<sup>④</sup>。在《赤光》所建构的中国革命话语中,要救亡图存必须革命,要革命必须实行反军阀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若反对这二者,哪怕存在任何妥协行为,便不是真的革命和爱国,甚至是反革命和卖国。与之相对应,青年党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主张便显得落后了。“爱国和革命——国民革命——反军阀、反国际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贯穿于“少共”的批判和分析中,并以其批判

① 伍豪《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赤光》第1期。

② 强《旅德的中国人快兴起了》,《赤光》第3期。

③ 任卓宣《答曾琦君书》,《赤光》第9期。

④ 红焰《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果真在森严纪律、肃清内部么》,《赤光》第25期。

青年党“振兴中国——培养国民的自尊心和敌忾心——引用传统光荣的历史”的话语及其论证逻辑,指出青年党人完全看不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乃出于资本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谓的“内惩国贼”也没有揭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军阀,认识不到“军阀是一个阶级”及其与政客、官僚、乡绅、流氓等“毛贼”的“皮”“毛”的关系。《赤光》从唯物史观、本质与现象、重点与全面等角度对反革命势力的话语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既争夺革命话语的阐释权,又批判对方话语逻辑的内在矛盾。

### (三) 以建构中国革命话语为中心,坚持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原则

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民众所受的压迫来自国际帝国主义而不是某一个帝国主义“强权”,苏俄及第三国际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给予帮助。对于这些方面,“少共”成员均有直观感受,因此其话语自觉遵循着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原则,这很容易得到旅欧华人的接受和认可。就16期《赤光》文章的比重来看,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反动风、苏俄等的文章远多于与中国革命相关的文章,这主要基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宣传的考虑。就论证思路来看,《赤光》涉及世界资本主义反动的文章,往往从帝国主义对世界无产阶级、落后民族的压迫以及工人运动、被压迫民族的国民运动兴起或高涨的角度论证;涉及中国革命的文章,一般从揭示军阀背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争斗切入,再与苏俄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进行对比,最后得出国民革命必须与各国工人阶级、各被压迫民族联合的结论。虽然苏俄对于留法勤工俭学生提供了物质帮助,但是《赤光》往往不会直接提及这一方面,以免被诬蔑为“卖国团体”,而是从各国工人阶级对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声援、对于本国资产阶级抗议的角度来体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些都是《赤光》以世界革命、国际主义为原则建构中国革命话语的体现及其切入点。

世界革命、国际主义是《赤光》所“移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和建构中国革命话语的基本原则,但是不可否认国民革命是当时旅欧华人思考的核心问题,因此《赤光》的宣传也基本围绕着中共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展开。《赤光》对于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一方面体现在反军阀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的论述,另一方面体现在重新诠释“爱国”与“卖国”的内涵。《爱国与卖国》一文指出,掌握政权的有产阶级才是有国的人,在面临外国侵略或外国寻求独立时,他们会要求工人阶级上战场,即所谓“工人救祖国”;当外国侵略的危险消失或无产阶级要求革命时,他们便要“卖国”,如鲁尔地区的德国资本家与法国资本家勾结镇压工人暴动。有产阶级所声称的“爱国”,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不但要反对本国的有产阶级,还要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只有世界革命成功后财富才属于无产者,在此之前无产阶级都是无祖国、无民族的;就中国而言,中国的各派军阀维护的不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本派军阀及其“太上政府”的利益,各派军阀之间虽有争斗,但是他们在压迫、榨取中国人民方面又是一致的,真正同情中国人民的是苏俄、各国共产党、各被压迫民族,因此国民革命必须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策略。正是基于对国家本质的分析,《赤光》揭露了各派反动势力“爱国”的虚假性,指出了国际联合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宣传了国际主义,批判了国家主义。

[责任编辑:吴荣生]